

## 吳燕和訪談(上)

口述：吳燕和

編輯：吳明仁、閻玲達

### 前言

2010年前後，幾位臺灣學生在夏威夷大學 (University of Hawai'i, Mānoa) 人類學系念書，有人在寫論文階段、有人正在出田野，有念考古學、體質人類學、也有念文化人類學的，全部都是對亞太地區研究有興趣的學生。約五十年前，長居國外的臺灣人類學家、美國東西文化中心(East-West Center)研究員吳燕和老師也在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攻讀研究所、並完成博士資格考，最後獲得國立澳洲大學research scholarship並取得博士學位。他擔任了我們幾個學生的口試委員，我們的興趣與研究也受到他的影響。我們想了解半個世紀前的夏威夷與夏大人類學系，甚至美國人類學。因此，這次的訪談希望大家帶回半個世紀前的夏大人類學系。

吳燕和的研究在1970年以前以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、考古為主，以及兒童「養育」的問題；1970年代著眼於華人在新幾內亞的移民

與適應；1980年代探討族群關係與認同問題；1990年代沿續了對於教養的興趣，著手華人兒童社會化的討論；在1990年代晚期之後，重心移往飲食與文化的研究[註1]。

吳老師的訪談將分成兩次刊出，第一部份主要是吳燕和在夏大求學的回憶以及人類學田野的反思。第二部份則是著重在1960、70年在夏大人類學系的師生及教學，從吳燕和的關係網絡出發。

### 問：您當初為什麼選擇夏威夷大學就讀？

燕和：我當時申請碩士班，收到夏威夷大學通知，給我好像一年的助教，而且收到的是夏威夷大學校長的聘書。如果沒有那一封聘書，我是出不了國的，來不了夏威夷，因為我們全家不准出國[註2]。當時我是中研院的助理員，我去教育部辦的時候，科長一看，說我不准出國，他說因為我已經不是大學生而是助教，不可以留學。不准出去當留學生，但可以應聘出國，所以，我就去僑務委員會申請出國。

[註1]：吳燕和主要著作可以參考：<https://wp.me/p2E35Q-q>

[註2]：吳燕和父親吳坤煌因白色恐怖入獄。



圖一：2018年初吳燕和與Midori Hino於日本伊丹市(Itami)的Miyanomae Cultural Village\*

到了夏威夷大學報到，我穿西裝打領帶，但每個人都穿著T-shirt，光著腳。我到系裡問秘書說我找誰報到，他說你的指導教授是Alice Dewey [註3]。Alice一看到我就很高興。後來我發現，是有人幫助我的，那年跟我同時進來當助理教授的考古家Richard Pearson，他是張光直的學生，在台灣做博論田野，去淡水那邊挖掘。他當研究生時，我是台大的學生，常常見面就很熟。所以我申請的時候，他一定看了，台灣的這個吳燕和他認識。我很快得到回信，還給我獎學金。我相信是他暗地裡幫忙，可以說是因為他和台灣的關係。一定是他去跟Alice Dewey講說這個學生很好，收他當助教。後來我發現，美國同學一個比一個有性格，平常是不會跟你講話的，好像每個人都是很大的樣子，脾氣又很壞，不高興就生氣。我說奇怪，大家學生不都是快快樂樂的嘛！Alice是完全相反，跟她一談就很高興。

**問：你們當學生時，East-West Center有很多的學生獎學金機會嗎？**

燕和：數百個獎學金。台灣來的，每年都有四、五十個學生，大概至少百分之八十拿到EWC獎學金，而且獎學金每年給，至少二年到四年。只有我是拿系裡的錢，我和王維蘭 [註4] 拿系裡的錢，別人都相信。

**問：您五十多年前來到夏大人類系，當時的生活及學習狀況如何？**

燕和：生活上很熱鬧很新奇。我記得我那一年到的時候有七十二位研究生，有三分之一在出田野，有三分之二在修課，有的同學回來寫論文。所以，熱鬧是幾個方面，不管是上什麼課都很多人，沒有什麼兩、三個人一堂課的，隨便一堂課都是二、三十個人，多的好像就是四、五十個，還有同學沒有選課也跑來湊熱鬧。那個時候我覺得系裡最好的課是Proseminar，凡是第一年來的，不管你在其它學校讀過或沒讀過人類學，不管你有沒有碩士學位都要上。那一堂至少有三、四十個人，每一個禮拜請一個大人物，上課大家討論，覺得很興奮。系裡當時也很有錢，

[註3]：Alice Dewey也是尹建中(1975)與崔伊蘭(1985)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，以及鄭香妹(1998)的口試委員。

[註4]：王維蘭是吳老師的第一任妻子，1969年畢業於夏威夷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。

當時系主任跟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申請了經費，說我們地理位置這麼好，是研究太平洋、亞洲的大本營，多給我們一點錢，讓我們在學術上訓練學生。

我覺得最困難的課是體質人類學，以前在台大就覺得很不得了，來上課的老師是動物學家出身，上了一學期的課都是講猴子，猴子的腸子跟黑猩猩的腸子怎麼樣不同，考試的時候還要考畫圖。到了美國才發現體質人類學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體質人類學的課每個禮拜找一個有名的教授，像夏威夷大學當時的校長，他就是遺傳學的教授，我當時上他課時，簡直是天方夜譚，那一堂課我們就要學A-G-T-C的排列，以前我只會猴子與黑猩猩的分類。

每一個週末，總有一個同學辦派對，到他家去。這個週末你開派對，下個禮拜是你，全系都去，學生就有五、六十人，連老師都來。田野回來的學生就講他們的故事，他們常說“our people”和“your people”，那個

“our people”是指我田野地的人，比如我的 Cook Island 的人怎麼樣、我那個 New Guinea 高地的人如何、如何。其實，那個派對、聚會等於大家在討論很多問題，所以我覺得非常熱鬧。

**問：您的博士論文原本是要做馬來西亞的 baba與nyonya的研究，但當時馬來西亞的政治環境讓你的計劃變得不可行，為何當初夏威夷的華人研究不是替代方案呢？**

燕和：在出國前，我是做台灣高山族的研究調查，在民族所時，特別是跟凌先生的訓練，是從十九世紀一路下來的民族誌，就是到一個村子裡就做。因為整個部落全部是同一族群或者民族，你到一個村子裡待個一年、二年，寫出一個民族誌，食衣住行、一年四季、宗教信仰、生產方式都要討論，這就是基本我們人類學調查方法。我到夏威夷時，中國人連一句中國話都不會講，碰到中國人講廣東話又不會講國語，然後，客家人跟廣東人不通婚，他們告訴我這個故事：你是廣

東人，你女兒如果愛上了一個客家人，他們要結婚的時候，父母應該要穿喪服，當作這個女兒死掉了。中國人之間的族群衝突就是那麼厲害，這是我後來慢慢發現的。夏威夷沒有單一的華僑界，以前也沒有看過誰去研究過華僑。夏威夷這麼複雜，又是日本後裔、又是 haole，[註5]我怎麼處理這個文化的問題？在東南亞也發現這個問題，你不能只從一個社群、一個部落或一個村子這樣出發。

**問：最後您的博士論文研究是做新幾內亞，為什麼後來沒有再回去做田野了呢？**

燕和：這個我想有二個原因，第一個是實際原因，我在East-West Center工作，無法回去田野地，要做很多學術交流的事情，因此無法像傳統的人類學家在同一社群不斷做田野調查。第二個是，一方面我以前在新幾內亞的華人報導人跑來夏威夷給我訪問；另一方面，當初我博論田野本來要去馬來西亞研究，因1969年馬來西亞排華運動而放棄。後來我又有機會去新加坡和馬來西亞，就找了一個題目來研究：傳統中國醫藥，這題目要

找專家很方便，所以我也不必回新幾內亞。後來我也有機會研究中國大陸少數民族，可以說我愈研究題目愈多，都是碰巧去了。

很快的回到你剛才那個問題，田野為什麼不在夏威夷做。我現在已經改變了，我現在天天在日本做田野調查。我現在住日本，每一次出去吃飯，餐廳就是我的田野地。兩年前我跟 Midori Hino [註7] 到法國參加會議，那個會議主題是我設計的，叫做「法國的亞洲食物與東亞的法國美食」，我們兩個去報告日本的法國飯、法國音樂、法國的歌舞。我們住那麼久，以後要寫一本書都可以的。

**問：您後來轉往ANU完成博士學位後，為何選擇回到夏威夷在East-West Center 任職？**

燕和：我當時有三、四個大學的 offer，維蘭說我們要回夏威夷，所以我就接受了 East-West Center。是她決定的，也不錯了，到現在我還是在校園裡面混，很舒服。可以這麼說，這也是命運。

[註5]：夏威夷語，過去指非夏威夷的外國人，現專指「白人」。

[註6]：Wu, David Y-H. 1979. Traditional Chinese Concepts of Food and Medicine in Singapore. Occasional Paper, 5. Singapore: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. 以及 Wu, David Y-H. 1987.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: Cultural Identity and Social Mobility. Nanyang Xuebao 42(1&2): 71 - 94.

[註7]：Midori Hino是吳老師的現任妻子，為日本愛知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。